

瓷都的崛起

——试论 13~15 世纪景德镇瓷业的发展轨迹^{*}

丁 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在多个层面的研究视域下,景德镇的崛起都令人惊讶。其一,在中国陶瓷史层面,宋元时期名窑众多,为何只有景德镇在明清时期脱颖而出?它的崛起是瓷业格局变迁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其二,基于比较的视野,在我国古代各类手工业中,很少有镇级单位像景德镇这样,成长为在文化、经济和技术等层面均称霸一时的单一手工业唯一中心(且是世界级别的中心)^④。其三,从时空维度来看,景德镇并不处于学界早已关注并热烈讨论的社会经济变化时段中的核心区域,但却更早酝酿甚至发生了变化。正因如此,探讨它的崛起,不仅能够推动对于中国陶瓷史的深入研究,也能为理解古代经济产业发展、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或延续提供重要案例。

和其他产业一样,古代陶瓷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地、人、时的相互作用。景德镇并不例外。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特定的窑场,环境、资

源的优劣与变化怎样影响了人的选择?人群内部的官方与民间如何各自选择而又形成能动的“合力”?特定的成长时段又会邂逅怎样的历史机遇?地点关联着窑场的生产条件和经营模式,官民“合力”的方式关乎着窑场的发展路径,加速成长的时段则暗含着历史的机遇,三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发展的有机过程。这正是本文拟围绕景德镇探讨的问题。

近年来,海内外一系列考古证据表明,景德镇产品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的提升至少可提前至明中期(明成化至正德)。因此,明中期之前的一段时间,应是景德镇积蓄力量、渐次变化的重要时段。本文将聚焦南宋中晚期至明早中期(13~15 世纪),描绘景德镇瓷业的发展轨迹,剖析促成其崛起的关键因素。

一 危机与转型

刘新园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即已指出,早在南

* 本文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国古代陶瓷烧成技术谱系研究”(项目编号:2023YFF0905800)课题“中国古代陶瓷窑炉时空分布研究”(课题编号:2023YFF0905801)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变革与竞争:9~17 世纪中国陶瓷外销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780002)资助。

宋时期,景德镇便已发生了严重的原料危机^[2]。面对危机,景德镇为何选择坚持?这种坚持又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又有怎样的影响?

(一)坚持还是放弃

原料资源是陶瓷手工业兴起的基础性条件,在很长一个时段,其几乎具有决定性意义^[3],对景德镇这样以精细白瓷^[4]为核心产品的窑场尤是如此。由于原料至关重要,又不易运输,所以早期大量窑场的选址以靠近原料地为原则^[5]。景德镇亦不例外,由此在北宋时期形成了散点式的窑址分布模式。随着青白瓷在市场上日渐扩张^[6],景德镇这种散点式的窑址数量也迅速增加,至北宋末期盛时窑址已有数百处^[7]。但这种增长模式很快遇到了瓶颈。

易于获取的上层原料,其在质量和储量两个方面的分布都不均衡。南宋早中期的生产很快就呈现出片区发展上的不平衡性^[8],有些仍能持续生产,有些则无以为继,迅速萎缩。危机导致人群分化:有些生产者选择坚持并寻找解决方案,有些则会选择放弃、迁移、转行。在南宋早期,从市场和生产两个方面来看,景德镇整体瓷业的状况晦暗不明^[9],相关从业者很有可能在上述抉择中徘徊。

如计划继续留在景德镇,从反面来看,景德镇山多地狭,又不处于具有明显优势的交通区位上,故而至今也未孕育出比陶瓷业更具比较经济优势的产业门类,这表明其资源环境和区位条件的长板和短板都极为显著,不易寻找更好的新产业方向,这种压力迫使“留守”人群在陶瓷业内探求变化。从正面来讲,除了原有陶瓷生产导致的择业惯性之外,景德镇产品所面对的市场局势和陶瓷产业利润丰厚的盈利传统,或许构成了生产者选择坚持陶瓷生产并积极寻找出路的重要动力。

1. 市场局势

从南宋时期陶瓷市场的产品结构来看,景德镇的核心产品青白瓷几乎没有竞品。首先,景德镇青白瓷以薄俏轻巧为特色,与其能够产生同质竞争关系的主要是其模仿对象定瓷。但两窑场距离甚远,故重点市场区域有所差异。

南宋疆土显然是景德镇的区位主场。其次,景德镇青白瓷在南方诸青白瓷窑场中长期处于领军地位,产品质量冠绝群窑。质量本身区分了市场层次。第三,尽管两宋时期青瓷势力大盛,但(青)白瓷与青瓷毕竟釉色不同,青瓷(特别是南方青瓷)胎体又偏厚重,因此在市场中具有区分度,竞争关系不强。由此推知,景德镇青白瓷具有独特的市场定位,并可就此创造出旺盛的市场需求。假如生产能够继续,景德镇将有可能在新形势下继续获得市场的积极反馈。而景德镇在北宋时期陶瓷市场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或能给予危机中的坚持者更多的希望。

2. 诱人利润的固有印象

景德镇似乎很早便建立了极强的盈利模式。早在北宋中期时,景德镇的商税便已十分抢眼^[10]。利润是征税的基础,这暗示着在北宋中期以前景德镇就已找到了一种利润丰厚、利于持续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盈利模式。关于利润丰厚的另一佐证是,景德镇是宋神宗为扩大财源实施市易法时唯一被建议设置“瓷窑博易务”的窑场,这一现象足以说明其利润之大已引起朝廷的注意^[11]。

景德镇陶瓷生产利润丰厚这一现象令人困惑。其一,在两宋名窑中,其产品声望一直不是最突出的^[12]。其在前期地位或逊于越、定,后期应不如定、汝、官等。其二,如前所述,北宋景德镇的生产模式近乎散点式的家庭作坊^[13];而彼时磁州窑、定窑已显出了集中生产、细密分工的态势^[14],生产模式更为高效。在此如此不利的情形下,北宋时期景德镇却仍能一路上行:镇级商税可与县级单位比肩,利润引发官方觊觎,行销范围可与“天下第一”的定窑^[15]媲美。其他更知名的窑场反而缺少此类记录或现象。这不能不让人感到诧异。

由于产品声望和生产模式似未显露突出优势,景德镇利润丰厚的原因只能从其他方面寻找。相较而言,早期普遍分布而易于取得的优质原料应是比较关键的因素。其一,精细白瓷的生产对原料要求极高。像定窑、景德镇窑这样具备生产精细白瓷能力的窑场并不多。而

一旦能够规模化生产,这种薄俏莹白的产品以其洁净优雅的面貌,对消费者极具吸引力,也因此可获得更大的议价空间,更有可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谋取更高的利润率。其二,与定窑相比,景德镇因原料特性而在烧成方面具有成本优势。景德镇产品以氧化铝含量较低的瓷石为原料,烧成温度远低于定瓷。即便是后来采用了二元配方,烧成温度仍比定瓷等低不少^[16]。而窑温高低与制瓷成本密切关联。这又为景德镇产品摊薄成本提供了机会。

由于优质原料普遍易取,景德镇的早期扩张模式看起来简单粗放而又顺利异常:选择原料资源优越的地点进行副业式的生产即可获利。即便政府实施专卖夺利,也未能阻碍景德镇的迅速发展。早期的这种市场竞争优势和盈利模式,可能初步建立起景德镇从业者对于自身优势和市场结构的认知,并固化为某种经营惯性和传统,这给后来者留下了深刻印象^[17]。与此同时,景德镇相对劣势的区位和地势使得其缺少能与陶瓷手工业媲美的其他选择。当原料危机浮现时,这些传统认知不仅从正反两方面构成了坚持生产的关键理由,更为其此后的诸多道路选择埋下了伏笔。

(二)新模式的形成

在原料危机的情形下,如坚持生产,最简单的化解之道,就是转移生产^[18]。从南宋早期南河流域生产片区的变化来看,一部分生产者的应对之策应是如此。但新的选址仍有原料质量与储量不确定性的隐患,而每次新的开始都意味着对原有生产设施的放弃和新一轮的建设投资。同时,也并非所有的原料产地都适合设立窑场。在此情况下,景德镇的从业者摸索出了新的生产模式。新模式提高了专业化程度,细化了分工,促动了工艺变革,进而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多方面证据表明,从南宋中晚期开始,景德镇瓷业状况明显回升^[19]。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和文献相互印证,表明其应对危机的方法已有所不同。其一,调查显示,南宋中晚期景德镇地区窑址的空间分布呈收缩趋势。南宋中期之

后,窑业生产区向南河下游收缩,湖田持续生产,镇区兴起^[20]。这与《陶记》可相印证。其二,近年在镇区的御窑厂、观音阁、清真寺、落马桥等地均发现了南宋中晚期的窑业堆积,而北宋晚期者则仅见于御窑厂、落马桥^[21]。这暗示了镇区生产地点的密集程度有所提升。其三,落马桥窑址出土的南宋中晚期青白瓷,胎体普遍出现了采用天然二元配方的情况^[22],表明彼时镇区窑场已经找到了新的原料来源来应对危机。其四,《陶记》明确品评了景德镇地区的原料产区,这表明景德镇地区选择生产地点的原则已发生变化。从业者对于原料产区质量差别的清醒认识,表明其将根据需要对原料进行选择。

综上,大体可勾勒出南宋中晚期陶瓷生产模式的变化趋势,即原料环节外置,而生产地点集中。这种模式不仅初步解决原料短缺的难题,还细化了分工,提高了专业化程度。亚当·斯密曾详细论证劳动分工精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促动作用^[23]。景德镇本身山多地狭,扩展空间不足,新模式集中生产的特征,更易导致空间局促,这一问题迫使人们寻找提升空间利用率的办法,由此可能又促成了景德镇覆烧工艺的调整和流行^[24]。而覆烧工艺又可进一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25]。

模式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想要启动并使之顺利运行,至少需要解决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资金问题。《陶记》品评的原料地点均与镇区有一定距离,近者8公里,远者35公里。距离提升了交通成本,故至少在其模式转换期,需要一定量资金的支持与担保。资本是经济增长,特别是支持经济模式变化的要素之一。景德镇能够支持模式变化,似与其民间资本雄厚有关。如前所述,北宋景德镇瓷业已产生时所瞩目的利润。至南宋,《陶记》的记录耐人寻味:宋史^[26]、陶瓷史^[27]研究者均据《陶记》认为当时的商税可达3万~4万贯,10倍于北宋水平。而蒋祈却仍有“镇之巨商今不如意者十八九”之叹,这是否暗示了景德镇还有一个巨商风头正劲、商税值更高的时期?《陶记》写作的年代,景德镇显然已完成生产空间模式的初

步变化,那么巨商的“不如意”,除《陶记》所说官方征敛无度外,是否也可能和推动模式转换有关?二是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后的粮食保障问题。新模式促动了陶瓷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生产集中同时带动了人群集中,使得粮食供应问题更为凸显。南宋中晚期,景德镇经济效益大为提升,购置粮食的资金应不成问题。在粮食供应方面,两宋时期,饶州属江南东路,此路农业以高产稳产“圩田”著称,粮食产量很高^[28],这对于景德镇手工业专业化进程而言,构成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南宋中晚期生产模式转型后效果显著。但同时也有一些问题,比较关键的一点是整体质量略有下滑^[29],这种情形除与当时从业者的市场策略密切关联外,也和整合资源力度尚较有限有关。任由质量下滑,则到元代时,景德镇或许也会显现出与磁州、龙泉、钧窑等名窑相似的道路选择^[30]。质优量大的原料资源尚在更远处,如欲充分利用,则需要扩大这一模式的运行范围、整合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优势资源,并推动其常态化。这有待更强力的动机和支持。

二 官(御)窑与民窑

在一般印象中,当元廷于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特别是当明廷于景德镇设立御器厂时,景德镇成为瓷都似乎便理所应当了。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首先,除了景德镇之外,给元廷或明廷供给陶瓷的窑场至少还有龙泉、钧州、磁州等,景德镇并非唯一。这些地点的窑业后来各有兴衰,可见与官方发生关联,并不必然成为“瓷都”。其次,关于御窑的作用,《中国陶瓷史》表达过截然相反的观点:“御器厂……不仅影响了民窑生产的发展,而且……给景德镇以及附近州县乃至江西全省带来了巨大的灾难。”^[31]以此类推,联系元廷对于南方人群管理的苛刻政策,浮梁磁局似也可有类似的影响。那么,该如何理解浮梁磁局、御器厂设置和景德镇崛起的关系呢?

(一) 磁局的助力

景德镇地区未处于元灭宋的主要战场。元

人 1276 年占领临安之后,于 1278 年便设浮梁磁局。元代景德镇延续并发展了南宋时期形成独特模式,在全国名窑中独树一帜,其市场规模、产品质量、行销范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32]。在这一过程中,浮梁磁局的设置,或主动或被动地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推动产品创新。浮梁磁局的主要任务是为朝廷制造瓷器^[33]。为完成任务,朝廷从全国汇集了大量优秀人才,设计并制造新瓷器^[34]。官方的制瓷行为本与民间经济无涉。但近年的研究表明,浮梁磁局管理相当松散^[35],这种情形使民窑有机可乘。民窑以官方新产品为标的,改善提升瓷器质量,提升竞争力,进一步占领了高端市场。诸多用于民间消费的高质量陶瓷配方变化^[36],暗示了浮梁磁局客观上的带动性和民窑的积极性。优质产品更易提升利润率,从而提高景德镇整体产业的效益。景德镇的高质量新产品,尽管产量不大,但流入民间市场后,很快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给各阶层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是促成后来明代御器厂设立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二,带动劳动力的聚集。研究者据浮梁磁局长官的品级,估计其拥有匠户 500~1000 户^[37]。这些匠户有相当一部分应为外来移民,属新增人口^[38]。这些匠户是劳动力资源中的技术力量,具有引领性。此外,1295 年浮梁升为中州,这表明浮梁户数应在 5 万~10 万^[39]。即便以每户 5 人计,此数目也颇为惊人。在以山地为主的浮梁地区,手工业更适合消化这些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既为陶瓷业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也形成了陶瓷业发展的压力和动力。

其三,资源开拓与整合。浮梁磁局制瓷以完成任务为要,对成本的考量远较民窑为少。所以,浮梁磁局更有可能耗费工本寻求最优质的资源,以生产最高质量的瓷器。在这一背景下,来自官方的强大力量,可能正是发现与开拓更远处高岭山等地点优质瓷土的重要甚至主要推力。随着民间从业者的积极介入,景德镇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优势资源的联动,进一

步巩固发展了自身独特的生产模式,促进了元代瓷业的繁荣。

元代晚期,由于定窑已衰,而霍州窑规模似有所不及,景德镇从各方面来看都已堪称当时生产精细白瓷的第一名窑;而若以产品创新而论,即便是龙泉窑也难望其项背。只是在元代,一来龙泉、磁州、钧州等地虽产品质量下滑,但规模宏大,尤其是龙泉青瓷风头正劲,显现出强大的市场影响力;二来从落马桥的出土情况来看,景德镇对于优质原料的运用和开发似尚未能全面推广,仍有相当比例质量较差的灰青釉和青白瓷产品在持续生产,这表明其尚未能全然聚焦于利润率更高的产品。此时距离其登顶瓷都,似尚有内外之困。元代尾声生产短暂、比例颇低的青花瓷,为明代的破局留下了线索。

(二) 御窑是与非

研究者一般据各类史书及地方志对元末战争的记录,推测从1352年起,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因战乱而受到很大影响^[40]。以落马桥出土的明早期民窑白瓷来看,其质量下滑,有泯然众瓷的趋势^[41]。故元末明初可被视为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又一个危机、低谷时期。在此情形下,御器厂的设置,无疑是景德镇重振瓷业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事件。

1. 御窑的目标

明廷对于窑场的选择,本质上既是对元廷用瓷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元代名窑地位的确认。因此,不论各地是否受到战乱影响,明廷对于景德镇、龙泉、钧州、磁州等地^[42]的陶瓷生产均抱有不同程度的期望。明代景德镇御器厂设立后即以青花瓷为其最主要的生产对象,并在民间严控青花瓷的生产,这显然说明景德镇的元代创新产品青花瓷正是明代皇族最为喜爱的瓷器之一。这是其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的重要原因。

御器厂之设,于景德镇陶瓷业而言,确实包含了很多积极因素,构成了有待开发把握的重要机遇。其一,御器厂的设置是对景德镇以往瓷业地位和产品质量的肯定,对低谷中的民

窑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刺激和激励作用。其二,和浮梁磁局一样,御器厂的目标在于获得最优质的产品,故其汇聚了全国顶尖人才进行产品设计和制造,并能够有效重新调动更大范围的原料资源,这些都具有潜在的引领作用。其三,御器厂生产的优良产品,客观上进一步提升了景德镇在陶瓷市场中的声望,使之成为陶瓷产地中的焦点。

但另一方面,明廷设立御器厂并没有推动景德镇陶瓷手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观意图。这至少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文献记载十分明确,明代御器厂的主要任务就是烧造瓷器并供宫廷使用^[43],并非获取利润。换言之,御器厂的目的在于不惜代价地制造“器”,而并不在意“利”的取得。二是诸多文献及考古证据表明,明代御器厂对御窑生产涉及的一切生产要素均采取了严防死守的态度,这与元代松散管理的情形大相径庭。无论是《明实录》中对于督窑官私赠御窑产品的严惩记录^[44],还是御器厂遗址的瓷器坑现象^[45],均可证明这一点。换句话说,明廷并不想与民间分享御窑生产的奥秘。

御窑有追求完美之器的能力,民窑有赚取利润的压力,同时民窑在前代也已形成了较为高效的生产模式传统,原料危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从后续的发展来看,官民结合后,才将双方的优势最大化,进而形成了更强的综合效应。御窑产品的比例、朝廷严控的产品清单^[46]和明初权贵墓葬出土的瓷器品种都将实现破局的关键产品指向青花瓷。那么此时景德镇如欲求得发展,最紧要的问题是:明代民窑如何才能突破限制,开展青花瓷的生产?

2. 青花出墙

落马桥等遗址及其他各方面材料显示,目前所见明代民窑青花瓷的始烧年代不早于明宣德时期。从明初的市场形势来看,龙泉窑尽管也受时局变动的冲击,但其产品及仿制品在海内外市场中的地位似有进一步提升^[47]。这些现象暗示了几个问题:首先,景德镇民窑的生产在明初仍在持续,但在质量提升和种类创新上,远不如御窑;其次,御窑对于生产的严控很

有成效；第三，高质量产品的缺乏对景德镇民窑的竞争力构成了限制，甚至使之无法维持宋元时期形成的市场地位。

问题似乎很严峻，但解决方案也近在眼前：循元代旧路，从官方力量中获取营养。那么如何突破御器厂的种种限制呢？就现有资料而言，至少有三个情形为民窑“穿透”厂墙提供了条件。

其一，御器厂并非孤岛，御窑的生产需要大量景德镇在地人群的参与。按照学界的一般观点，明早中期御器厂由匠户以劳役形式承担。但匠户的人身自由并未与御器厂绑定，应可正常出入于御器厂。研究者指出，明代早中期，在匠户之外，雇役匠、窑户、里甲户等群体均参与了御器厂的烧造任务^[48]。如此则御窑的生产奥秘更不易保守。在条件成熟时便可为民营所用。

其二，青花料来源的拓展。按《江西省大志·陶书》所记嘉靖年间匠师窃取回青等现象^[49]，此类事宜应颇普遍，且应并非始于嘉靖一朝。只是明初青花料的来源仅有进口一途，管控应比后期严格得多。至明宣德时期，御窑青花瓷已采用进口料与国产料混合的方式进行生产，表明国内已有新青料来源。青料来源的拓展，于官方，增加了管控成本；于民间，则提供了更多的获取机会。民窑青花瓷大体于此期出现，应非巧合。

其三，权贵人群的需求与支持。明廷对御器厂控驭甚严，对内赏赐极少，即便藩王、功臣亦不易得。但受宫廷影响，藩王、功臣等权贵群体显然对青花瓷非常渴求。从当前明早期藩王相关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其应是民窑青花瓷的重要消费群体^[50]，甚至在制样层面参与了生产。至正统年间，朝廷尚三令五申明确禁止民间生产青花瓷。民窑之所以敢于违抗禁令，并不断扩大生产，除生产利润足够诱人、地方政府管控力度有限外，其背后煊赫的消费群体亦应充当了“靠山”式的角色。以藩王为代表的权贵群体对于青花瓷的渴求，无疑对民窑突破厂墙、积极生产青花瓷等违禁的新产品有强烈推

动作用。

以景德镇陶瓷业的经营传统，和其在元晚期已经达成的市场地位和产品口碑，一旦突破厂墙，掌握了新产品的生产材料和生产技术，则卷土重来、更进一步指日可待。而恰在民窑青花瓷开始生产不久，景德镇便与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邂逅，使其进一步超越了元代龙泉窑的市场成就，迈向了增长的巅峰。

三 扩大的市场

早在元代中晚期，景德镇即在产品发展道路上显现出与其他名窑的不同。其他既往名窑或下沉为影响力有限的地方性窑场，或以数量换质量维持或扩大规模^[51]。景德镇则因为新原料来源的发现、新模式的扩展与巩固、浮梁磁局的刺激和松散管理，在兼顾一般性市场的同时，着力于创新产品的开发，维持并开拓高质量精细瓷器的生产而逐渐扩大在高端市场的优势。待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开始生产之后，恰逢其最重要的竞争对手龙泉窑产品类型渐偏粗重、生产日趋衰落，这进一步向景德镇产品让渡了高端市场。景德镇凭借民窑青花瓷的生产而在全国市场上日趋重要，很快便几乎独领风骚。仅以这一情形，景德镇已开创了此前宋元名窑未有之局面。

从陶瓷外销的历史来看，国内外陶瓷市场具有联动性。在中高端陶瓷市场层面，国外市场往往与国内一致。龙泉窑的衰落与景德镇民窑的崛起几乎是同步发生。原本“天下龙泉”的陶瓷市场，在短暂的青花、青瓷并行之后，最晚至明弘治时期便由景德镇担纲主角。至此，景德镇产品在海内外的市场成就已与龙泉青瓷持平。

正当景德镇青花瓷勃兴之际，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 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1521 年麦哲伦经过美洲抵达亚洲，开辟了一系列新航路。在经历了与原有海上势力的斗争与博弈之后，欧洲人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商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大大突破了原有的市场范围。景德镇的产品随即潮水一般涌向欧洲市场^[52]。

骤然扩大的市场,为生产群体制造了强烈的生产力。而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一市场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势力在全球航路上的竞争还在不断扩大。由此,领先于世界的陶瓷产品,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之下,终于形成了全球性的浪潮,将生产地点景德镇推向了瓷都的巅峰。

四 结语

景德镇的崛起并非一帆风顺。资源条件的变动,迫使坚持继续从业的生产者寻求出路,由此促动了在地资源的深入开发和景德镇生产模式、组织方式的优化。官方力量无意于促动经济,但其介入客观上提供了潜在的机遇,催化了高质量新产品的出现,托举了景德镇产品的口碑;民窑力量为及时把握这一机遇“费尽心机”,最终突破限制,实现了新产品的大规模量产和推广。负载着来自元明宫廷顶级审美的优质产品,甫一出炉,便邂逅了具有全球史意义的时代机遇,全面突破了既往外销瓷的市场边界,最终风靡全球。由此,全球市场成为了景德镇陶瓷经济持续繁荣增长的诱引。

除原料外,景德镇各方面的发展条件都相当普通甚至恶劣,其既非地理要冲,又无更多特色资源,故而并未被赋予行政区划级别上的重要性,长期居于“镇”这一等级。正因如此,在元明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中,景德镇的崛起,显露出不同于其他地方经济体的独特张力。其崛起背后地与人的交互、官与民的博弈、内与外的竞争,透露出经济发展背后各方力量的复杂角力,蕴藏了古代手工业经济的丰厚内涵。其崛起背后的独特理路,并非既往的经济发展理论可涵盖,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系列促动陶瓷产业发展要素次第发生、又耦合成嵌套的齿轮组合推动景德镇前进的过程中,民窑力量承受了更大的发展压力,并“搏杀”在生产与市场风口浪尖的一线。作为黯淡于文献记载的研究对象,景德镇民窑的发展线索时常无声地隐匿于历史叙事的背后,但又草蛇灰线地透露出积极

的能动性、开拓性与强劲的生命力,这也提示着景德镇活力之所在。

- [1] 梁森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第2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 [2] 刘新园、白焜《高岭土史考》,《中国陶瓷》1982年第7期。
- [3] 秦大树《瓷窑遗址的组成与地层学》,《考古学研究》(十三),科学出版社,2022年。
- [4] 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第180、181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 [5] 权奎山《中国古代瓷窑遗址的分布和窑场的布局》,《说陶论瓷》,文物出版社,2014年。
- [6] 黄义军《宋代青白瓷的历史地理研究》,第131~136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 [7] (南宋)蒋祈《陶记》,《浮梁县志》卷四,康熙二十一年刊本;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银坑坞:景德镇南河流域窑址考古调查报告之一》,第2~5页,文物出版社,2020年。
- [8]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银坑坞:景德镇南河流域窑址考古调查报告之一》,第2~5页,文物出版社,2020年。
- [9] 丁雨《兴与衰?》,《唐宋时期的中国制瓷业》,宁波出版社,2023年。
- [10]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六之一〇,第5077页,中华书局,1957年;刘新园《宋元时代的景德镇税课收入与其相关制度考察》,《景德镇方志》1991年第3期。
- [11] 丁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札记三题》,《青阳瑞木:历史考古青年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 [12] 王光尧《明代宫廷陶瓷史》,第269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 [13] 同[1],第25页。
- [14] 秦大树《磁州窑的生产方式初探——考古发现的窑业遗迹所体现的生产模式》,《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6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 [15] (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学海类编》(第7册),广陵书社,2007年。
- [16] 同[4],第167、349页;同[1],第277页。
- [17] (南宋)蒋祈《陶记》,《浮梁县志》卷四,康熙二十一年刊本。
- [18] 权奎山《试论南方古代名窑中心区域移动》,《考古学集刊》(第11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 [19] 裴亚静《简论景德镇宋元时期青白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 同[6],136~141 页。
- [20] 江建新《景德镇窑业遗存的考察与研究》,《陈昌蔚纪念论文集》(第 3 辑),财团法人陈昌蔚文教基金会,2006 年。
- [2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江西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西北角外围宋元遗存考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24 年第 3 期;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2024 年度景德镇观音阁窑址发掘简报》,《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 年第 11 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景德镇市董家岭横弄清真寺遗址发掘简报》,《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 年第 11 期;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宋元遗存发掘简报》,《文物》2017 年第 5 期。
- [22] 翁彦俊等《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南宋和元代青白瓷胎釉分析——兼说“二元配方”起源》,《东方博物》(第 56 辑),中国书店,2015 年。
- [23]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第 3~18 页,商务印书馆,2015 年。
- [24] 刘新园《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兼论景德镇南宋与元代瓷器工艺、市场及税制等方面的差异》,《景德镇陶瓷》1981 年增刊。
- [25] 刘新园《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考古》1974 年第 6 期。
- [26] 梁庚尧《南宋的市镇》,《汉学研究》第三卷第二期(1985 年 12 月)。
- [27] 刘新园《宋元时代的景德镇税课收入与其相关制度考察》,《景德镇方志》1991 年第 3 期。
- [28] 漆侠《宋代经济史》,第 132 页,中华书局,2009 年。
- [29] 同[24]。
- [30] 丁雨《空间的收缩?——元代景德镇陶瓷研究札记》,《考古学研究》(十三),科学出版社,2022 年。
- [31]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第 360~364 页,文物出版社,1982 年。
- [32] 同[30]。
- [33] 尚刚《元代陶事两题》,《文物》2017 年第 9 期。
- [34] 刘新园《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磁局与画局》,《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2 年第 1 期。
- [35] 陈洁《浮梁磁局与元代官瓷——兼论至正型元青花的性质》,《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 年第 9 期。
- [36] 同[22]。
- [37] 李民举《浮梁磁局与御土窑器》,《南方文物》1994 年第 3 期。
- [38] 刘新园《元代窑事小考(一)——兼致约翰·艾惕思爵士》,《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1 年第 1 期。
- [39] 《元史》卷一八《成宗本纪》,第 393 页,中华书局,1976 年。
- [40] 陆明华《元代景德镇官窑瓷烧造及相关问题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 10 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年。
- [41] 高宪平等《景德镇落马桥窑址明代早期遗存发掘收获与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23 年第 1 期。
- [42] 同[12],第 114~187 页。
- [43] 同[12],第 152、153 页。
- [44] 如《明实录·宣宗实录》卷三四,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内官张善伏诛”条,第 863 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年。
- [45] 权奎山《江西景德镇明清御器(窑)厂落选御用瓷器处理的考察》,《文物》2005 年第 5 期。
- [46] 《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一六一,正统十二年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敢有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第 3132 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年。
- [47] 陈洁《明代早中期瓷器外销相关问题研究——以琉球与东南亚地区为中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 12 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 年。
- [48] 胡宸《跳出官私之分:明代景德镇烧造贡瓷差役结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4 年第 3 期。
- [49] (明)王宗沐编纂、黄长椿等点校《江西省大志》,第 369 页,中华书局,2018 年。
- [50] 陆明华《明代各地藩王用瓷再研究》,《王者之器:明代藩王用瓷》,江西美术出版社,2023 年。
- [51] 同[30]。
- [52] [美]罗伯特·芬雷著、郑明萱译《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瓷的时代》,第 6 页,海南出版社,2015 年。

(责任编辑:杨冠华)